

 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丛  
CHINESE ECONOMIST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A COLLECTION OF YU GUANGYUAN'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 于光远改革论集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丛  
CHINESE ECONOMIST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 于光远改革论集

A COLLECTION OF YU GUANGYUAN'S WORKS ON ECONOMIC REFORM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于光远改革论集/于光远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6

(中国经济学家改革论丛)

ISBN 978 - 7 - 80234 - 199 - 9

I. 于… II. 于… III. 经济改革—中国—文集  
IV. F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9126 号

书 名: 于光远改革论集

著作责任者: 于光远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4 - 199 - 9/F · 736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咨 询 电 话: (010) 68990692 68990622

购 书 热 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 <http://www.develpress.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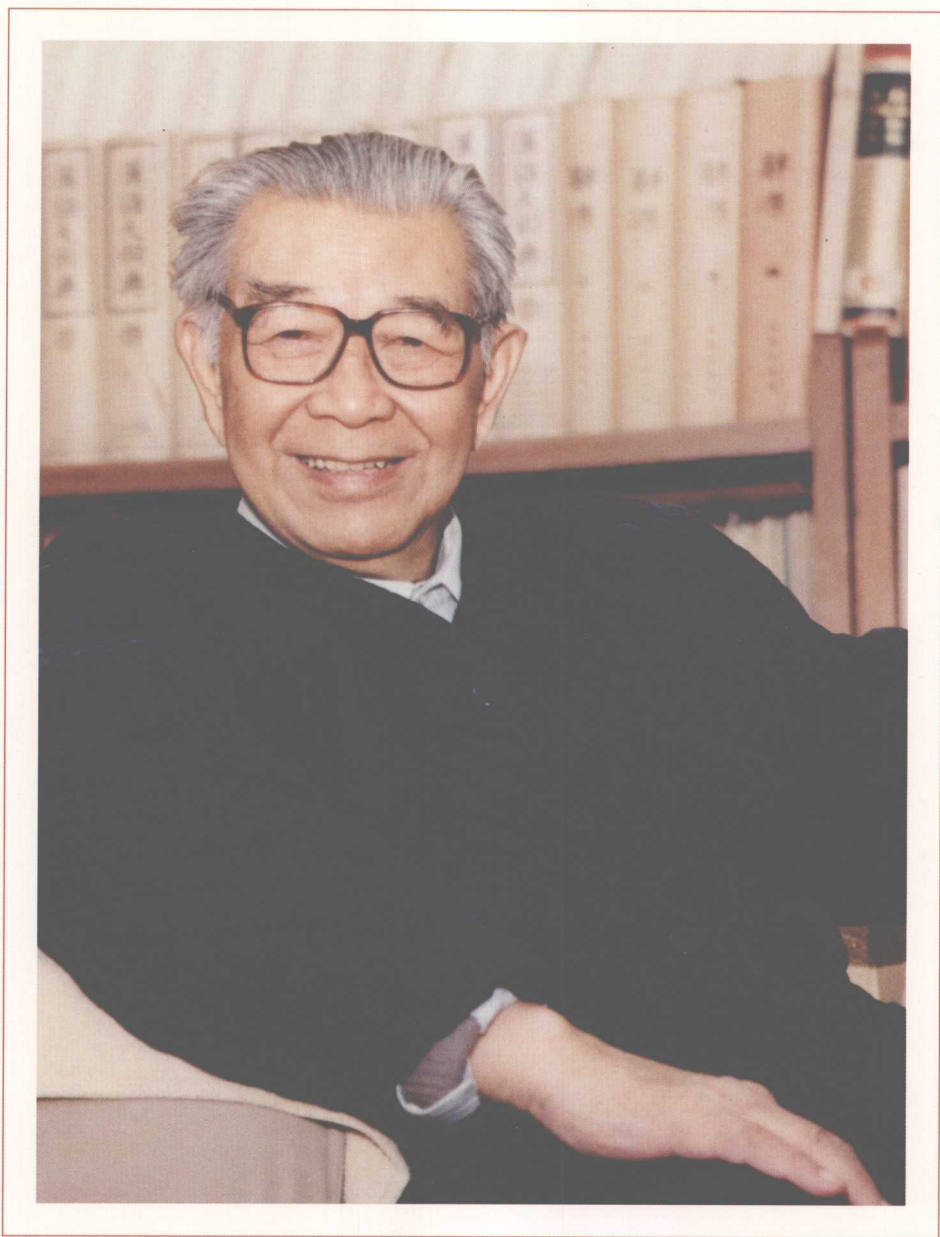
电 子 邮 件: [fazhan@dr.c.gov.cn](mailto:fazhan@dr.c.gov.cn)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于光远

本书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出版



# 出版前言

Publication Foreword



这套丛书，是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继续推进这场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而编辑出版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的伟大事业。经济学家是非常活跃和有贡献的群体。这套丛书各卷的作者，都是这场伟大变革的亲历者和直接参与者，是长期为改革开放建言献策的经济学家。他们之中有改革开放之初已年过古稀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最年轻的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有的主持或者参与过关于改革和发展重要课题的研究，有的参与过党和国家关于推进改革开放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是人们所公认的。

这套丛书各卷所选的文章，大多是过去30年间对中国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发生过直接影响的调研报告、政策建议、理论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各卷文章，都是由作者自己编定的；已经去世的薛暮桥和马洪，是由他们的后人编定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探索中前进的过程，读者从这套丛书

里，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对于改革开放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以及他们对某些问题的不同见解和思想历程。

这套丛书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倡议的，得到各位经济学家的积极响应，得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年5月

# 作者简介

Author's Introduction

于光远，生于1915年7月5日，中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曾用名郁锺正，上海市人。1935年参加北平“一二·九”运动。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文化教育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及党管理科学的工作。1948年至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任科学处、理论教育处处长。期间，兼任《学习》杂志总编、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央科学小组成员等职。1964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同年兼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7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并重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同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第二版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1982年至1992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大、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部委员。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 目 录

Contents 

- ▶ 作者自序 ..... 1
- ▶ 在第四次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17  
(1978年10月)
- ▶ 我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 ..... 30  
(1978年)
- ▶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改革 ..... 40  
(1978年)
- ▶ 关于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 ..... 45  
(1979年)
- ▶ 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 ..... 68  
(1979年)
- ▶ 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态度 ..... 79  
(1979年)
- ▶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 84  
(1981年2月)
- ▶ 为什么国民生产总值不能准确地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 ... 90  
(1981年2月)
- ▶ 应该对环境进行计量 ..... 100  
(1981年)

- 
- ▶ 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 108  
(1983年3月)
  - ▶ 全国战略中的地区战略和地区战略中的地区战略 ..... 123  
(1984年5月)
  -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 134  
(1986年11月27日)
  - ▶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 ..... 174  
(1988年11月25日)
  - ▶ 要的是现代市场经济 ..... 183  
(1992年6月8日)
  - ▶ 历史上和当前中国的私有和公有 ..... 190  
(1993年7月15日)

# 作者自序

Author's Preface

收入这本文集的文章，包括了我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侧面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为了保持时代的印迹，文章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但这样一个编排方法，会给问题和内容的脉络造成一些干扰。为了对这个缺陷有所弥补，我觉得有必要按内容来写一个序言。这里收入的大部分文章，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距今已经二三十年。某些文章的写作背景，如果不加说明，今天的人们读起来可能颇觉隔膜。考虑到这点，在这篇序言中，我特别会对某些问题讨论的背景给予说明。

## 一、关于按劳分配理论的讨论

这本文集收入了我在第四次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摘要。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是从1977年开始组织的，共召开了五次。当时面对的基本问题是解放思想，冲破“文革”带给人们的精神枷锁。

“文革”末期，我恢复工作之后，到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1976年春夏之交开始“批邓”以后，我们的工作也受到冲击。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不过，“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但是在一段时间中，因为仍然受到“文革”中的那套理论的束缚，许多工作开展不起来。大部分报刊上讲的仍然是“文革”时期的理论。长期的思想禁锢，特别是对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的残酷打击，使许多人不敢想问题，想了也

不敢说。不改变这种状况，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活跃，都是不可能的。1977年2月，我提议召开一系列学术讨论会，突破当时在理论上的障碍。这样，北京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召开了一次讨论会，研究针对“四人帮”宣传的那套理论，首先讨论什么问题。研究的结果是从三个问题入手：第一个是按劳分配问题；第二个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革命和生产的的关系问题，主要是“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问题；第三是“四人帮”在上海插手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

“文革”当中，按劳分配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名义下受到猛烈的攻击。姚文元写了长篇文章，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宣传。按劳分配被说成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成了一种罪恶的源泉。而这套说法，成了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个论断确定的所谓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论断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那么，社会主义阶段中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哪里来？总要有个说法。这个根源竟然被找到了按劳分配上。这样一来，“全面专政”就更有了理由。按劳分配成了政治禁忌，在经济活动中把报酬和劳动紧密联系起来的方法便不敢使用，奖金取消了，计件工资基本取消，计时工资也失去了计量劳动的意义。

显然，这样的精神禁锢不打破，生产是不可能搞好的。当时经济学者大都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不过要去扭转它，不少人还很有顾虑。因为这已经不单纯是个经济理论问题，而要涉及到所谓“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成了最大的政治问题。“四人帮”倒台后的一段时间，政治路线是否会发生改变，一度还不明朗。这是人们的顾虑所在。

事实上，直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时，政治报告中仍肯

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革”中宣传的基本路线。所以，当时经济学界的讨论虽然直接针对的是“四人帮”的论述，但却在更深层上碰到“两个凡是”的障碍。讨论的似乎是一个具体的经济理论问题，但背后是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问题。那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没有展开，“两个凡是”的障碍还没有从哲学上搬开。而经济学界已经在事实上去碰这个问题了。

1977年4月13、14日召开了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第一次理论研讨会，参加的单位有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国家劳动总局、南开大学等三十多个单位的一百多人。那时我兼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会上讨论了按劳分配和物质刺激的关系、按劳分配是不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等问题。参加者各自亮出了观点，而分歧已经显露出来，最敏感的分歧是在按劳分配是不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问题上，但讨论最多的却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在这方面还有政治障碍，不少人还有顾忌。

我和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是，认为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这个理论，正是极“左”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在按劳分配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要害理论正在于此。这样，会后特别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为下一次的讨论进行了准备。同年6月22、23日，召开了第二次研讨会。这次参加讨论的有一百多个单位的四百多人，其中有不少人来自北京之外。会上许多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论点，当然也有的人持相反观点。这次讨论冲击了一个“禁区”，活跃了理论界的气氛。

讨论的高潮是1977年10月底至11月初举行的第三次讨论。参会的除了在京的135个单位的五百多人外，还有来自23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三十多个单位的三百多人。当然，很多人是来听会，



并没有发言。在这次讨论会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广泛、深入，除了上面已经说到的问题外，还有按劳分配中的平等和不平等、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权利”、按劳分配和劳动报酬形式等。比起前两次讨论来，一些问题的讨论更具技术性，更像经济学，比如计件工资、奖金。不过，这些今天看来很技术性的问题，当时却和政治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应当为发放奖金恢复名誉，应恢复奖金制度，在当时就引起很大的震动。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今天听起来似乎很难理解，但当时的思想氛围确实就是这样。

经济学界的思想虽然已经启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报刊上基本上仍然在讲“文革”中的一套。直到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一篇有关按劳分配的文章，才标志着按劳分配的名誉得到正式恢复。这篇文章是国务院研究室写的，由冯兰瑞执笔。国务院研究室的前身就是“批邓”前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批邓”后一度准备取消，“四人帮”倒台后被保留下来，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文章在1978年初写出后，邓小平同志看过，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修改后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发表后还受到坚持“两个凡是”者的质问。此后，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即在学术界展开热烈的讨论，各省市负责人也纷纷表态响应。到1978年1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后，“两个凡是”的问题才从思想路线和政治上解决。

## 二、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

文集中选了两篇出访东欧后的文章，即《我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和《关于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南共联盟取得政权，宣布南斯拉夫为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和斯大林发生分歧，被斯大林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此后，中国共产党也不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中断了和南共联盟的关系。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苏两党论战中，我们仍然把南斯拉夫作为负面靶子。

1978年，中央派出一个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团长是李一氓，我和乔石是副团长。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实地考察、接触，然后向中央提出报告，说明南斯拉夫的基本状况，对于两党关系是否应恢复提出意见。在此之前，我曾接触过苏联和东欧国家一些经济学家对改革的看法，但是没有实地考察过。南斯拉夫的实践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考察形成了一个概念，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出访回国后，代表团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认为，斯大林试图把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拒绝，导致苏、南关系恶化，而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党。根据代表团的报告，党中央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和南共联盟的关系。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党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

1978年8月，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到会的有几十个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认为这个会议可以看做党的高级领导人开始重视改革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这个会议是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由李先念同志主持召开的。邓小平在1977年下半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恢复了职务，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有几个东西受到注意。一个是南斯拉夫考察结果，它使我们在思想上更加明确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对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的认识，对于党内在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作用。会上也有人对于南斯拉夫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怀疑，但是大多数人都赞成代表团的看法和中央的意见。不过，对于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许多人都表示不能接受。事实上，我们后来的改革也没有走那样一个路子。

另一个引起注意的是谷牧访问西欧六国的报告。过去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对资本主义只有批判，但这个报告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中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报告中讲到法国农场主不能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的例子给人很深的印象。为了保证农场的经营，政府规定，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取得农业学校的毕业证书，还要在其他的农场实习两年，考核合格才能继承。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好的制度，值得借鉴。

胡乔木、我和马洪以国务院研究室名义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一文在会上也引起注意。会上还有一些发言很有反响。如姚依林讲到，我们今天要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要了解资本主义，并要善于和他们打交道。他引用了一句列宁的话，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当时对很多同志很有说服力。

这个务虚会一直开到9月才结束。会议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得到中央的重视。邓小平、李先念当然很重视。叶剑英副主席对这个会特别重视，认为开得很成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工作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具体负责。当时建立了四个小组来负责研究改革的具体问题：一个是体制组，由张劲夫负责；一个是引进组，由汪道涵负责；一个是结构组，由薛暮桥负责；一个是理论方法组，由我负责。几个小组非常活跃，研究了许多问题。1979年底中央又派我带队去匈牙利考察改革。这次考察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多种模式的认识，同时使我们对改革过程的许多具体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

### 三、生产力标准和所有制改革

“四人帮”倒台之后，在理论上开展的一项主要工作属于“拨乱反正”性质。从理论上着眼，我认为从“拨乱反正”到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明确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

“文革”中，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宣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造成很恶劣的后果。批判“唯生产力论”的一个理论根据是列宁曾批判过“生产力论”。事实上，这个根据是很成问题的。列宁曾批评苏汉诺夫等人一再重复社会主义需要一

定的生产力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而不懂得历史“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苏联一些学者把列宁批评的观点称为“生产力论”，这一命名本身就不确切。以此为根据来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更不恰当。我的看法是，在哲学中，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理论，称为唯物论；承认意识第一性的理论，称为唯心论。那么，承认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第一性的，理应称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四人帮”倒台后的一段时间中，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仍将“唯生产力论”作为贬义词，一些文件中也这样来使用。人们还不敢真正把体制的选择放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标准上来考虑。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1976年冬天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第二次会议，当我看到文件上仍然把“唯生产力论”作为一个错误观点来对待时，就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个电话，表示不同意这种写法。这个意见被反映到当时的中央领导那里，几个领导把我找去，问我的看法。我就把为什么不应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道理讲了一番，我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愿意把自己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而这样一个论点可以简称为“唯生产力论”。我不同意把“唯生产力论”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也不同意再批什么“唯生产力论”。我说，为了表示自己观点的坚决起见，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后来，我和林子力等同志对“唯生产力论”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他们专门写了一部批判对“唯生产力论”批判的书。这个工作是和按劳分配的讨论同时进行的，是那时开展的理论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1979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态度》。我讲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所有制的态度是：凡是最能促进生产力